

李敖全集
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台湾◎李敖／著

胡适评传

胡适研究



李敖全集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研究 / 李敖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1

(李敖大全集; 4)

ISBN 7-5057-1503-8

I.胡… II.李… III.胡适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705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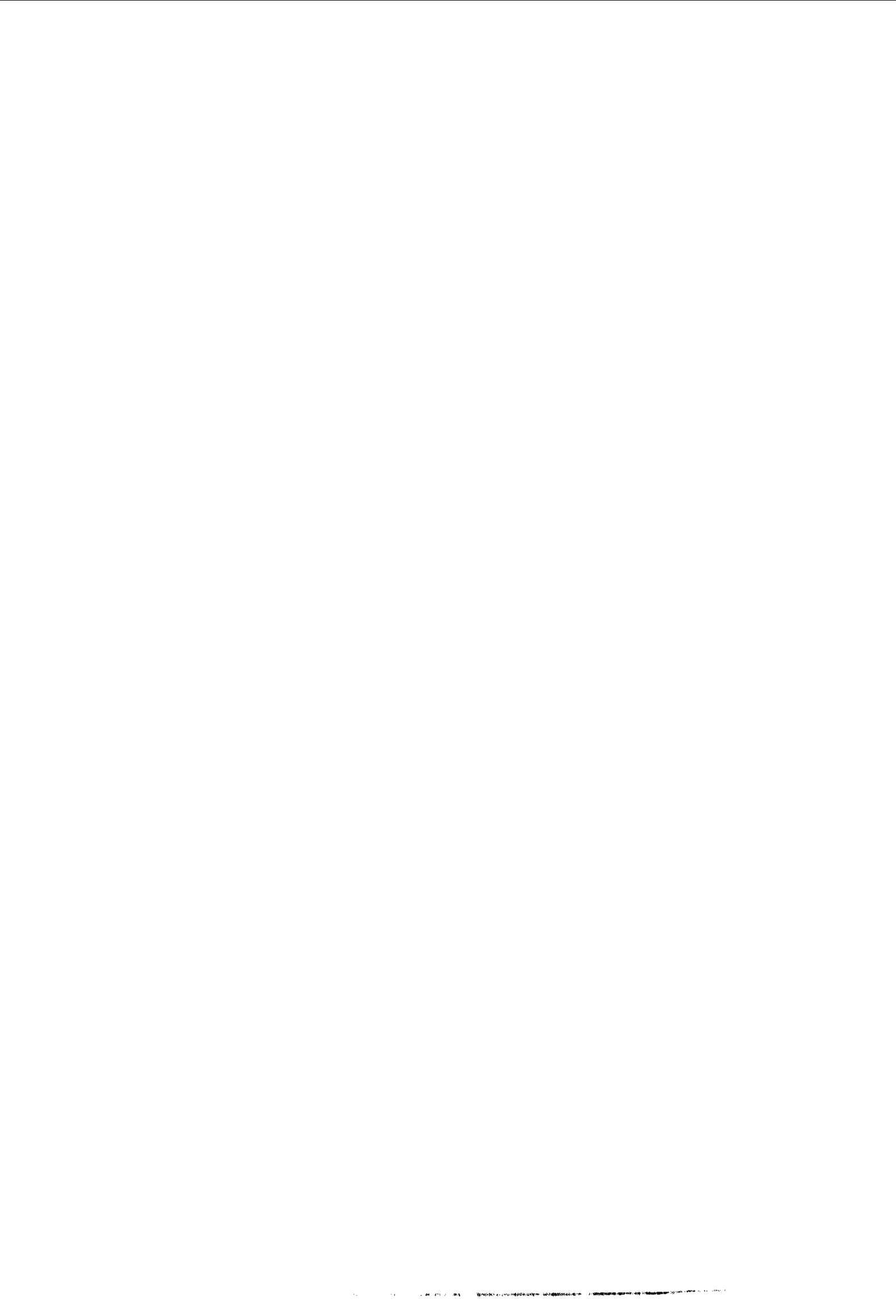
书名	胡适研究
作者	台湾 李敖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875 印张 334000字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
印次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503-8 / K·126
定价	30.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7-0878

总 目 录

JFC1104

胡适研究	(1 - 213)
胡适评传	(215 - 470)
附录	(471)

胡适研究



目 录

前记	(5)
播种者胡适	(14)
附录一 由文章谈到胡适(马五先生)	(29)
附录二 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叶青)	(31)
附录三 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 假设(郑学稼)	(45)
附录四 我们应该赶过他(王洪钧)	(52)
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	(57)
附录一 再论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叶青)	(96)
附录二 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 运动(郑学稼)	(120)
附录三 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 信和文(田尚明)	(159)
三人连环传	(167)

李敖大全集

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183)
附录 文章忌刻薄(刘星)·····	(185)
关于《胡适文存》·····	(187)
评介《丁文江的传记》·····	(199)

前 记

胡适先生死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三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

“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

“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后，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表在三月一日的《文星》杂志里。

* * *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眼看就快两年了。两年来，真可说是一个既“冷漠”又“吵闹”的局面。

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

“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后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胡适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后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三鞠躬以后，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记得胡适死后不久，胡虚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六期(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里，翻译了一篇《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他在译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为什么？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像得到的。近几年来，

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满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门生高足,际此“围剿胡适”的风暴声中,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除了一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而出来说几句外,很少有人挺身而出为“胡适思想”做一是非辨的!你想: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现在胡适死了快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头,胡适的“门生高足”更是安静得可爱了,他们安静地看着,看着那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来开创一个“吵闹”的局面。

* * *

所谓“吵闹”,应该从头说起。

一九六一年的年底,我应《文星》杂志编者的邀请,为他们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后，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报》的社长雷啸岑先生（马五先生），《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先生，《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先生，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东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头上面、书信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

当然相对的，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潮湃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的“三大‘评论’”：《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在这些刊物上，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对《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只写过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的文字，来答复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叶、郑两先生，我也只答复一次，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我也懒得辩驳了。

我为什么不再答复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对这两位先生，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要了解他们必须从他们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 motives and images）上一刀扎下，从“基本思路”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心理运作”（mental operation）的过程。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后，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么主义以后，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算了吧！放他们去吧！”

* * *

谈完了“冷漠”和“吵闹”两个局面以后，我觉得我该谈谈《播种者胡适》本人。我先抄《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六日）中，周伯达先生的《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里的一段话：

《文星》第五十四号还有胡颂平先生底《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后校改》一文说：“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传，一张便条，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校改本，送给徐高阮、毛子水、台静农、姚从吾、台大图书馆、成功大学图书馆、李敖、蒋孟邻、沈宗瀚、钱天鹤’。先生吩咐我：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后，请你照我最后的校本改正后，分送给他们。”据胡颂平先生说：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李敖这位年轻人，在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是先写李敖，而后写蒋孟邻的。关于这件小事，我只能做如下推断：其一、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其二、是李敖所作的《播种者胡适》（本年一月一日）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本年二月一日）这两篇文章，深为胡适所赏识。否则，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做得好才如此地看重他的。果真这样，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我相信今后注重考据的人，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

这段令人发笑的“推断”，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其中有一点，所谓胡适“深为”“赏识”我这篇《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请“今后注意考据的人”来“考出这个秘密”了，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杨树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文星》七十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

一天下午，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地结束谈话，好让他静养。可是他止住我离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我急忙设法推开，我说：“先生，我现在的范围很窄，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我就懒得看它！”

“不，你应该看看这一期。”他一面说，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划。“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他一面指给我，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划出来。情绪已是颇不开心。

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李敖这位年轻人”的“深为”“赏识”罢？

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死后，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播种者胡适》后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

天,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

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账。基于这个理由,我除了写一部《胡适评传》外,决定再印行这本《胡适研究》。

* * *

这本《胡适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种者胡适》,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一篇“祸首”。

第二篇是《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正是胡适“遽归道山”的日子,胡适生不及见,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可是限于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作为附录。

第三篇《三人连环传》,是写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三个人的。这种连环写法,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为某些人所欣赏,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刻划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在报上痛骂我,我只好把这种批评,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后,作为附录。

第五篇《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 * (略——编者), 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 可算是《胡适评传》中的一小节, 这段历史, 我在《胡适评传》中还要细细写到它。

第六篇《关于〈胡适文存〉》, 是一篇“特殊的”书评。最初登在《大学杂志》, 后来删了一部分, 改登《自由中国》。这本是我高中二年级时候所写的一篇文章。胡适先生后来告诉我说: “雷震特别写信给我, 推荐你这篇文章。”

第七篇《评介〈丁文江的传记〉》, 也是一篇书评。对这本书缺点的指摘, 我本已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 可是他在出版时都没有改正, 我颇为失望, 也颇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未免不够虚心, 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看过我的信了, 如此而已。总之, 对《丁文江的传记》这本书, 我觉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传记。

* * *

编完这本小书以后, 我感到一种轻快。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么“深厚的世交关系”, 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学宗》(三卷二期)中所称的“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 但胡适跟我之间, 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 不过那也许要在“天下太平”之后。现在我只把这本《胡适研究》先印出来, 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 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老朋友”。

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在台北

* 本版收入 6 篇。

* * 此文本版未收入。